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敦煌吐鲁番文书 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刘安志 著

DUNHUANG TULUFAN WENSHU
YU TANGDAI XIYUSHI YANJIU



商务印书馆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刘安志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刘安志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359-2

I. ①敦… II. ①刘… III. ①敦煌学—文书—研究
②西域—地方史—研究—唐代 IV. ①K870.64 ②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129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刘安志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7359-2

2011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定价: 52.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

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 年 2 月

目录

序 1

唐初对西州的管理

——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 5

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 24

读吐鲁番所出《唐贞观十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
及其相关文书 44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 65

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 99

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 116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 151

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
为被悬点入军事》 177

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 206

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 226

唐代西州的突厥人 254

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 278

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日历考释 319

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 328

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

——以出土文书为中心 343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 354

作者主要著述列表 370

后 记 374

序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是刘安志自 1996 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迄今为止，围绕敦煌吐鲁番学与西域史关系这一主题，开展学术研究的成果结集。

安志博士的学位论文《唐朝西域边防研究》，就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西域的边防体制、军事部署、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其中所依据的出土文献资料除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以外，还有新疆其他地方出土的文献、内地出土的碑刻墓志等，其搜罗应该说是充分的。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史籍文献记载以及前人的研究，广为联系，深入剖析，探讨出许多有价值的新结论，应该说是一篇有学术质量的学位论文。在 1999 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我曾多次与他谈及，让他将学位论文补充修改出版。安志博士总是觉得：有些东西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有许多问题都有待深化，还有些东西仍需进一步考订、落实。转眼 10 年过去了，虽然他的学位论文没有出版，却诞生了一批围绕着西域史的专题研究成果，也就是这里提交的 16 篇专题研究论文。这些研究中，有宏观的新认识，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跋吐鲁番鄯

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等；也有微观的考订和论证，如《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以出土文书为中心》、《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等。这大概就是安志博士对唐代西域史深化认识、考订论证的努力。他的每一篇研究，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互不联系的单独篇章，实际上都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的甚至是环环相扣的。这种对尚不清楚问题的点点求索和深化，极大地提高了他对唐代西域历史认识的水平。实践证明，他选择这样一种研究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一条一步一个脚印、务实求真的道路，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安志博士的研究采取的是用微观考察、论证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将出土文献与传统史籍以及历史遗址实物等多种资料相结合论证的方法，将研究的问题层层推向深入，最后能落到实处，得出令人信服的新结论。例如唐在西域所设安西四镇，曾几次遭到吐蕃侵扰破坏，出现了三罢三置的记载，其中第一次见于咸亨元年，《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均记此年四月“罢安西四镇”，学术界大多也都认为此次四镇就是罢废了。而安志博士在《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一文中，依据对多件吐鲁番出土咸亨年间涉及安西文书的仔细分析，以及对唐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吐蕃”、在青海开辟进攻吐蕃新战线，阻止了吐蕃对安西进攻的宏观分析，得出结论说：“唐虽于咸亨元年被迫下令罢安西四镇，但由于西域形势发生变化，实际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二镇，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并未放弃。”同时还得出一个新的认识：“透过以上描述可以清楚看出，高宗统治时期，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并非软弱无力，而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类似的对出土文献与传统史籍相结合的细心考察和分析论证，可以说贯穿于本书的每一篇研究论文之中，正如安志博士在后记中说的：“我还感受到了学术的尊严，深悉严谨踏实和创新实乃为学之重要标尺。本书所收诸论文，不管论题大小，深浅如何，大都严格遵循这一标尺，绝不为有辱唐门学风的粗制滥造之作。”正因为他能牢牢把住严谨踏实、开拓创新这样一个为学之道的基本标准，所以他的每一篇研究既呈现出求真务实的特点，又能析出新义，推陈出新，为西域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西域史的研究，随着地下文献不断出土，必然会不断向纵深发展，对于从事西域史和敦煌吐鲁番学方面的研究者说来，则是一个不断深化求索、开创新局面的过程。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希望安志博士在未来似锦的学术征程中，继续不断地锦上添花。

陈国灿

2009年3月28日于珞珈山

唐初对西州的管理

——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

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平东突厥，扫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统治的北部边患，也奠定了唐王朝向周边地区扩展的基础。同年九月，伊吾城主石万年来降，唐以其地置西伊州；^①贞观六年，改名伊州，开启了唐经营西域的历程。为了清除来自青海一带吐谷浑的威胁，巩固河西地区的稳定，贞观九年，唐出军平定吐谷浑，^②从而铺平了进军西域的道路。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置西、庭二州；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③。从而在西域东部建立起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

唐于高昌先置西昌州，不久更名为西州。^④卢向前先生曾对西州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九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82页。敦煌所出S.367号《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此据〔日〕羽田亨：《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载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77页。又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第6110—6113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第6156页。

④ 《唐会要》卷九五《高昌》：“（贞观）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副总管牛进达平高昌国……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徵谏曰……上不从，以其地为西昌州，又改为西州。”（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01—1702页）（宋）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昌传》：“捷书闻，天子大悦，宴群臣，班赐策功，赦高昌所部，拔其地皆州县之，号西昌州。特进魏徵谏曰……不纳。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22页）

的成立时间有过探讨，认为西昌州改为西州的时间与安西都护府设置的时间是相同的。^①不管怎样，西昌州的设置早于安西都护府，当无疑问。安西都护府置于交河城，西昌州或西州置于何地，则未见明文记载，一种可能是与安西都护府同治于交河城，另一种可能则是治于高昌城，这里毕竟是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故学者们多认为西州治于高昌城。^②不管西州治于何地，都存在一个与安西都护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安西都护府乃唐初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取名“安西”，似带有“安定西方”之意。至高宗显庆三年（658），方西迁龟兹，在西州存在时间达十四五年之久。其初置于交河城的目的何在？而且，唐代都护府与州府的性质与职能有区别，据《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护州县官吏》记载：“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谕五教。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姓，录囚徒，恤鰥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覘候奸谲，征讨携离；长史、司马贰焉。诸曹如州、府之职”。^③因此，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探讨。柳洪亮先生认为，从贞观十四年到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同时并存于西州，各有一套办事机构，前者主西域诸藩，后者主西州政务，安西都护虽兼西州刺史，“而不检校州事”。^④陈国灿师则

①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② 柳洪亮：《“西州之印”印鉴的发现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收入氏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③（唐）李林甫等纂、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7、755页。

④ 柳洪亮：《“西州之印”印鉴的发现及相关问题》，收入《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第363—371页。

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提供的信息，提出了“合署办公”的观点。陈师指出，在显庆以前的西州，实际是安西都护府在行使州官的职权，而西州虽有其名，实无其制。贞观十六年（642）郭孝恪任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这种长官的一身二任使西州建制很可能也并到了安西都护府合署办公，由安西都护府代行了西州的职权。此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西迁龟兹之时。^①李方先生进一步发挥了陈师提出的“合署办公”之说，并考察了显庆三年以后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之间的关系。^②今在前贤已有宏论基础上，对此问题再作一定探讨。

陈师所论，多为贞观十六年以后的情况，而此前情形也并非无迹可寻。据《旧唐书·谢叔方传》载：

谢叔方，雍州万年人也……历迁西、伊二州刺史，善绥边镇，胡戎爱而敬之，如事严父。贞观末，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洪、广二州都督。永徽中卒。^③

由此知谢叔方在贞观年间曾先后担任过西州、伊州刺史。荣新江先生认为谢叔方为贞观十四年至十五年初的西州刺史；^④柳洪亮先生定谢叔方刺西于贞观十四年八月至十六年九月；^⑤郁贤皓先生定谢叔方刺西约在贞观十四年，刺伊约在贞观十六年至十八年。^⑥就目前所见

①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唐史研究》，载黄约瑟、刘建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第295—296页。

② 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③（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七上《谢叔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73页。

④ 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89年第2期。

⑤ 柳洪亮：《“西州之印”印鉴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第367—368页。

⑥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511页。

资料看，谢叔方当为首任西州刺史，却不是驻于西州的首任安西都护。我们知道，唐代都护的品级为从二品到正三品，州刺史为从三品到正四品下，^①伊州为下州，初置时期的西州品级应与此相当，刺史同为正四品下，这与都护的品级并不相当。由“历迁西、伊二州刺史”的记载看，谢叔方不可能担任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因为由安西都护（正三品以上）转为伊州刺史（正四品下），是降职，而不能言“迁”了。贞观十六年九月，唐“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②凉州为中都督府，都督为正三品，当时的安西都护的品级，应与凉州都督相当，同为正三品。从这一意义上讲，谢叔方不可能是首任安西都护。首任安西都护当是乔师望，《文馆词林》卷六六四《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有云：

宜遣五品一人，驰驿往西州宣扬朝旨，慰劳百姓，其僧尼等亦宜抚慰。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及为乡间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乔师望景（量）拟骑都尉以下奏闻……^③

诏文时间为贞观十六年正月，^④柳洪亮先生断乔师望任安西都护时间为贞观十四年九月至十六年九月，^⑤郁贤皓先生则定为贞观十五

① 《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745—746、754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六年九月癸酉，第6177页。

③ （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校证：《日藏弘文本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9页。

④ 《册府元龟》卷一六四《帝王部·招怀二》：“（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往西州抚慰。其旧首望有景行淳直者，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百姓疾患，赐医药，老病独粮食乏绝者，咸加赈给。”（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82页）《新唐书》卷二《太宗纪》：“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第41页）参见〔日〕池田温等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⑤ 柳洪亮：《安西都护府初期的几任都护》，《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收入氏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第355—362页。

年至十六年，并说乔师望应是以西州刺史守安西都护的。^①郁先生此说恐误。唐制：“凡注官，阶卑而拟高则曰‘守’，阶高而拟卑则曰‘行’。”^②这是针对散官与职事官而言的，乔师望“守安西都护”，是指其散官低于职事官“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为职事官，不可能去“守安西都护”。显庆三年，乔师望官衔为“正议大夫、守凉州都督、驸马都尉”，^③正议大夫为文散阶正四品上，凉州都督为职事官正三品，乃阶卑官高，故曰“守”。由此亦可推知，乔师望在贞观十五年左右散阶，明显是低于职事官安西都护的，故称“守安西都护”。诏文仅记乔师望官衔为“守安西都护”，而未记其兼西州刺史之职，联系谢叔方任职西州刺史的时间，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当时的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可能同时并存于西州，是两套机构，安西都护与西州刺史亦分别由二人担任，即乔师望与谢叔方，一为“安西都护”，一为“西州刺史”，二人可能都同时任在西州共事过。^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是一种二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详后）。而吐鲁番所出“西州之印”文书的发现，可进一步说明此问题。

1981年8月初，吐鲁番吐峪沟千佛洞出土一件有关西州官府征车牛的帖文，上钤“西州之印”一方，极富学术研究价值，兹摘录如下：

（前缺）

1……………帖宁……

①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一），第511页。

②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28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六二《册乔师望凉州刺史文》，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9页。

④ 柳洪亮《“西州之印”印鉴的发现及相关问题》一文，业已指出乔师望与谢叔方分别为第一任安西都护和西州刺史，实为卓见。参见氏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第367—368页。